



保育香港歷史筆記

中西區叛逆之都史蹟徑

灣仔區廣州起義史蹟徑

第三期增刊二 2018 年 4 月 第一版

孫中山史蹟徑主要介紹孫文早期在香港活動的地點，但他在 1895 遭香港政府驅逐出境後，多以海外為據點，但一直到民國政府成立以前，香港仍然維持不少反清據點。這些據點可能因為不是由孫文主持而少為人知，長春社建議的史蹟徑希望可令大家知道除孫文外，很多人士也在香港戮力反清。

香港的反清歷史可分為三個時期：第一期為 1895 年到 1904 年的興中會時期，當中只有兩次軍事行動；第二期為 1905 年到 1908 年的香港同盟會分會時期，共有七次軍事行動；第三期 1909 至 1911 年同盟會南方支部時期，有兩次軍事行動，當中包括較多人認識的「三二九（黃花崗）之役」，是在香港統籌的。

日期	事件
1895 年	興中會在香港成立，廣州之役
1899 年中	《中國日報》創辦，但到 1900 年初才出版成功
1900 年	興中會惠州之役
1901 年 1 月 10 日	楊衢雲遭清政府暗殺
1901 年 5 月	青山農場成立
1903 年初	大明順天之役，但在行動前已失敗
1904 年中	李陞格致工藝學堂成立
1905 年	同盟會在東京成立
1905 年 11 月下旬	香港同盟會成立，陳少白任首任會長
1906 年秋	馮自由接手《中國日報》，並任香港同盟會會長
1907 年 5 月 22 日	饒平黃岡之役
1907 年 6 月 2 日	惠州七女湖之役
1907 年 9 月	欽州防城之役
1907 年 10 月	汕尾之役
1907 年 12 月	鎮南關之役
1908 年 3 月	欽廉之役

1908 年 4 月 29 日	河口之役
1909 年冬	同盟會南方支部成立，胡漢民任支部長
1910 年 2 月	廣州新軍之役
1910 年 4 月	支那暗殺團在香港成立
1911 年 4 月 27 日	三二九之役(黃花崗之役/廣州起義)

中西區叛逆之都史蹟徑

第一站 捷發號四樓同盟會分部 現恒生銀行總行

自 1908 年河口之役失敗後，同盟會軍事計劃停頓，故一改過往秘密作風，公開招攬會員，於當年上旬在上環德輔道先施公司對門三樓（按先施公司當時在皇后大道 172-176 號，德輔道中 173-179 號的先施要到 1917 年才開張，以往是先施大廈，現為南豐大廈）開設會所，以民生書報社為名，後因地方太少，在同年底把會所遷至「德輔道中環街市對門」的捷發號四樓，並易名為少年書報社¹。

馮自由指常駐會所的有馮自由、李紀堂、陳少白、劉思復等。劉思復原計劃炸死廣東水師提督李準，但在廣州裝配炸彈時不小心引致爆發受傷，1907 年被捕後，1909 年被釋放，在 1910 創立了支那暗殺團。曾參與 1911 年廣州起義的選鋒隊長莫紀彭和支援起義行動的徐宗漢也曾到過捷發號四樓。據莫紀彭回憶，捷發號是一間白糖店，四樓內有酸枝桌椅，地氈，又可打桌球。不過當時已欠租三四個月，而陳少白更是從不出現²。陳少白當時為《中國日報》翻譯《幾度山恩仇記》，但有時送不出稿費，陳便不交稿³。

第二站 青山棧 現中環街市

在中環街市內的青山棧由李紀堂創設，出售經小輪運來的青山農場農產品。

李紀堂是香港富商李陞三子，在宗譜的名字為李寶倫⁴，又名李柏或李北。1896 年由楊衢雲主盟加入興中會。青山農場在 1901 年 5 月開設，李紀堂稱之為「種植畜牧場」，初時用去了他一萬餘元。開辦農場的目的是「以便內地逃亡及海外歸來諸同志之集合⁵」。

¹ 馮自由，《中國革命運動二十六年組織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48 年，第 197 頁。

² 莫紀彭，《三年回憶語》，載《莫紀彭先生訪問紀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 年，第 135-136 頁。

³ 同上註，第 150 頁。

⁴ 見《雲步李宗譜》，《列傳譜》第 34 頁。

⁵ 《興中會革命史料》，中央文物供應社，1973 年，第 345 頁。

有關青山農場在反清活動的回憶要到北伐後才公開，但有關青山農場在農業上的資料，其實是有的，而且還是當時的資料。德臣西報 1906 年 7 月 27 日第五版，便有關於青山農場的大篇報道。文中形容青山農場是荒山中的綠州，而且採用歐洲的耕種方法，沒有使用傳統中國以糞便為肥料的方法，灌溉方式則以鐵管引水。農場種植的水果有葡萄、香蕉、蘋果、梨、橙、西瓜、蜜瓜、荔枝和菠蘿等。蔬菜則有生菜、蘿蔔和西洋菜等。農場還有養豬，而且非常衛生潔淨。香港政府的報告也有提及青山農場曾嘗試繁殖歐種豬，可惜不算太成功⁶。



1895 年落成的第二代中環街市，青山棧便是在其中。

1907 年的報告指政府進口了不同種類的甘蔗，這些甘蔗的產量較一般種開的高，並把這些甘蔗分發給新界的農戶，而除了青山農場外，其他農場獲分發的甘蔗都死光。政府認為失敗的原因是華人不明白用進口甘蔗的好處，或者根本沒有力氣把握機會⁷。事實上青山農場種植甘蔗非常有名，引入檀香山的品種（這可能是鄧蔭南所為），夏威夷研究農業昆蟲的學者也到農場參觀，並受李紀棠招待⁸。

除了鄧蔭南外，青山農場還有一個「管場人」。馮自由記道：「丁未年潮州黃崗及惠州七女湖二役之敗將，常隱匿其間，以避清吏通緝。管場人以若輩不愛惜花果，任意毀壞，屢請紀堂加以制之，而紀堂皆一笑置之⁹。」馮氏沒有提供這個人的名字，但德臣西報和香港政府的報告則有提及。政府報告只簡單的說是 Mr Kim，要德臣西報則指是 Mr O.H. Kim，相信是同一個人。

第三站 革命軍實行部及黃興藏身地點

擺花街 12 號

擺花街的據點和三二九之役（新曆為 1911 年 4 月 27 日）有直接關係。辛亥年正月（即 1911 年 1 月尾到 2 月）同盟會在香港成立革命軍統籌部，地點在跑馬地黃泥涌道三十五號（現 153 號），由黃興任部長，立即再在擺花街成立實行部，負責製造炸彈準備暗殺，人員有李應生、李沛基（援）和莊六，另有女黨員徐宗漢、莊漢翹、卓國興、黃悲漢、李晚援。執行部在三月遷往廣州甘家巷¹⁰。

幾乎所有文獻也沒有紀錄擺花街門牌，但據莫紀彭回憶，在廣州行動一個月前，也即是執行部遷回廣州時，莊漢翹的十八歲小叔馮子平同情革命軍，和他的好友高翰書在三二九行動前一個月要求黨人把他們藏起，向他們的家人要求七千元贖金。當時他們的藏身地點為擺花街 12 號，

⁶ Report of the Colonial Veterinary Surgeon for the year 1907.

⁷ Report on the Botanical and Forestry Department, for the year 1907. Laid before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by Command of His Excellency the Governor, August 5th, 1908, p508.

⁸ F Muir, Report on Investigation in South China 1907, in F Muir and O H Swezey The Cane Borer Beetle in Hawaii, 1916, Hawaiian sugar planters' association, p52.

⁹ 馮自由，《革命逸史》，新星出版社，2009 年，第 475 頁。

¹⁰ 《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周年文獻，革命之倡導與發展，中國同盟會四》，正中書局，1964 年，第 124 頁。

而有一段時間兩人由徐宗漢陪同，徐直到三二九行動前才回到廣州附近河南鎮的據點¹¹。而據馮自由回憶：「事敗後，黃興出險來港，亦假此地為醫傷之所，徐宗漢為之看護¹²。」清楚指出「藏參」地點和實行部為同一地點。

徐宗漢原名徐佩萱，廣東香山人，十八時嫁兩廣總督署洋務委員李慶春的次子李晉一。李晉一曾和陳少白一同學習英語，李晉一在婚後數年病逝，遺下一子一女。1907 至 08 年間，徐到南洋檳榔嶼幫助其姊辦學時加入同盟會，於 08 年先回廣州後到香港找馮自由，再回廣州和高劍父組織同盟會分會¹³。

三二九之役在 4 月 27 日失敗後，黃興逃到河南鎮找徐宗漢，在她的掩護下在 4 月 29 日到香港，由於當時風聲很緊，黃興便匿居在擺花街十二號，而馮子平和高翰書二人仍在，黃興也吃了一驚。黃興那時右手已斷了兩指，有一指將斷未斷，要到雅理氏醫院（現荷李活道 77-81 號）做切除手術，須家屬簽字，徐宗漢便以黃興妻子名義簽字，日後弄假成真，成為真正夫婦¹⁴。如果覺得這個故事浪漫，請留意黃興當時已有妻子，他 19 歲的兒子黃一歐也有參與廣州起義¹⁵。

第四站 香港李陞格致工藝學堂 現前中區警署

李紀堂的父親李陞在 1900 年去世時，留下了一百萬元的遺產給他。李紀堂除了用了約一半遺產去支助大明順天之役外，還興辦了李陞格致工藝學堂（也稱李陞格致書院）。學堂在 1903 年開始籌備，當時已找到應該是小利蘭·史丹佛大學首名華人畢業生鄭華汰回香港當校長。

鄭華汰為廣東新寧人，（即台山，他姓氏的英語併作 Fong 也因為是以台山話發音），1866 年 4 月出生，1881 年到美國加州求學，成為基督徒，1896 年畢業於史丹佛大學的科學及經濟碩士課程，同年成為美國紐約興中會會長，1903 年到香港籌備開辦李陞格致工藝學堂¹⁶。學堂在 1904 年 3 月 5 日開始招生，3 月 22 日啟館。上課時間為星期一至五下午三時，學費一年二十四圓。第一年上課地點是荷李活道 18 號的一座洋樓¹⁷，收了七十個學生，但到年終考試只剩下了三十五個¹⁸。除鄭華汰外，他的太太 Emma E Howse 教英語，另一興中會會員楊襄甫教中文¹⁹。

鄭華汰



¹¹ 莫紀彭，《毀家報黨三故事》，載《莫紀彭先生訪問紀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 年，第 192-193 頁。

¹² 馮自由口述，孫宣武筆記，《黃花岡一役統籌部之活動與國外籌餉》，原刊 1953 年 3 月 29 日台北《中央日報》，收錄於《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周年文獻，革命之倡導與發展，中國同盟會四》，正中書局，1964 年，第 102 頁。

¹³ 馮自由，《革命逸史》，新星出版社，2009 年，第 598-599 頁。

¹⁴ 同上註，第 600 頁。

¹⁵ 黃一歐，《回憶先君黃克強先生》，載《辛亥革命回憶錄》，第一集，文中資料出版社，1981 年，第 614 頁。

¹⁶ *The Hong Kong Telegraph*, 17 May 1906.

¹⁷ 見 1904 年 4 月 27 日《中國日報》的廣告。

¹⁸ *Hong Kong Weekly Press*, 6 February, 1905.

¹⁹ 見 1904 年 3 月 22 日《中國日報》的廣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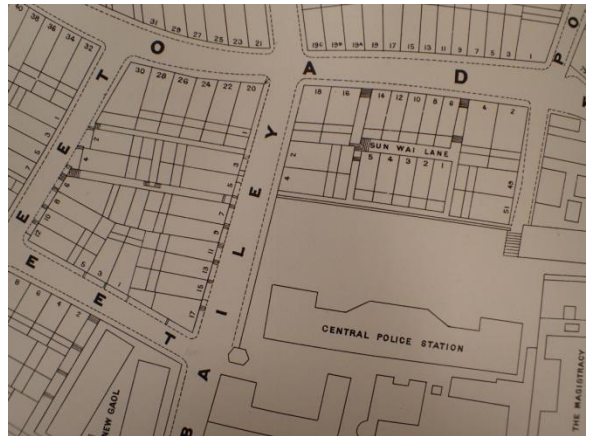
香港李陞格致工藝學堂啟館廣告

（李陞即李璇字玉衡其令嗣捐館資
於本學堂以留先君名者）

記曰智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
工百工之事皆聖人之所作也自周禮
闕冬官而考工之職不詳於中土古者
自治之世猶得抱其大巧若拙之義以
自鳴迨五州通商以還貨物充斥於伍
部之市者十色伍光遂使東方大為減
色有心人欲挽回公權枝節節而為
之鮮有能探其本者本學堂諸同人深
維至計思所以濬厥利源為我中國青
年祝前途之發達以為富國自強其礎
特開工藝學堂標捐鉅資購儀器聘教
習先從事於算化聲光電力汽機礦商
諸學將地建廠另授組工各藝以
為中材以下地步庶使學成致用大可
以益國小可以成家豈特收回已失之
利權而已耶昔日本末變法前外貨侵
灌土產平庸二十年來工藝學堂開而
日貨於商戰場中居然獨樹一幟見者
驚奇爭相運販斯其明效大驗也有志
向學者其毋河漢斯言茲將本學堂辦
法撮其大要如左 一凡來學諸生不
拘何籍英文漢文俱可進堂按其資格
深淺循序指授養成備材人才然多授
以專門之學 一商學為當務之急本
學堂每禮拜一至禮拜五下午二時
專設一課講授商務學凡入俱可來
學不必限於生徒繩尺 一本學堂另
備研究一科有志研究化學考監研
實者設 一本學堂聘有美國士丹佛
太學卡里芳尼亞太學侯氏女史專授
英文有志習西文而欲得名師親授者
勿失機緣另有通儒專以新法教授漢
文庶無偏廢之弊 一由內地來學諸
生本堂必為之照應膳宿等事 一本
堂現辦醫科將來陸續添聘專門教習
教授一切專門之學 一本堂現在荷
李活道大館口四十八號洋樓光明爽
潔堪堪為肄業之所 一本堂學費甚
廉每年暫收二十四員分兩季上期繳
交

甲辰年 二月初六日
李陞格致工藝學堂值理謹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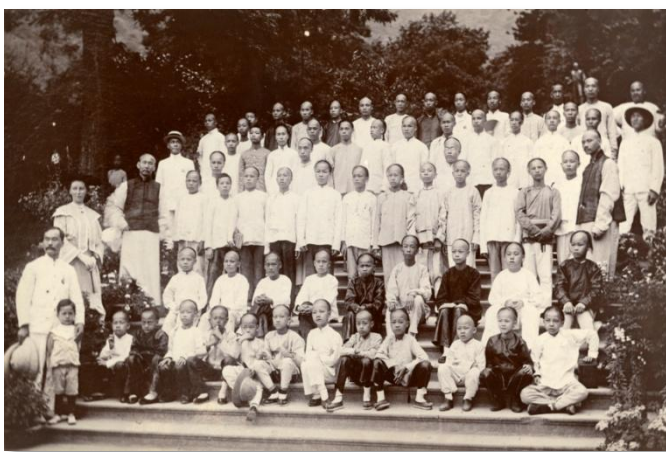
現時荷李活道並沒有 18 號，道路南側第一間建築物便是舊中區警署總部大樓，門牌為荷李活道 10 號，之後便跳到 20 號。總部大樓在 1919 年落成，在李紀堂創立李陞格致工藝學堂時，總部大樓原有一排房屋，門牌號碼為雙數 2 至 18 號，政府要到 1916 年 5 月才收回土地興建總部大樓²⁰。學堂創立時所在位置，就是總部大樓的西北角。



1901 年的政府地圖顯示當時的荷李活道仍有 2-18 號。

第一屆畢業禮在 1905 年 1 月 28 日皇后大道中 66 號下學年的新校舍舉行。鄭華汰指學校不是只要讓學生懂得操作機械，還要明白當中原理，可以領導工業生產，不用再在外國人指導下工作。第二屆的畢業禮在薄扶林道 31 號舉行，有學生的兵操表演，李紀堂在致辭時指兵操和體能訓練可以在外國侵略或遇到強盜時保家衛國。

可惜的是鄭華汰在 1906 年 5 月 9 日去世。校長的離世加上李紀堂當時財困，學校只辦了兩屆便結束。



左圖：鄭華汰和學堂的學生合照。
右圖：位於荷李活道 18 號的學堂。



²⁰ CO129/432 p.676.

位於荷李活道 60 號的建築物雖然和反清活動沒有直接關係，但前身是由是興中會和中華革命黨成員霍汝丁經營的萃文書坊（又稱書莊），也是華仁書院創校時校舍所在，已有一百年左右的歷史，極具保育價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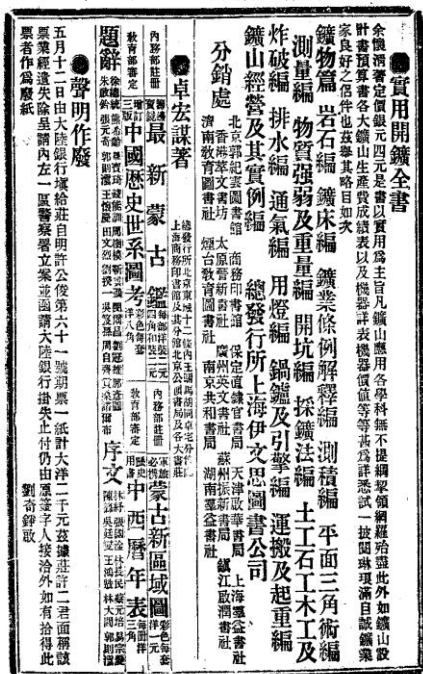
楊衢雲在 1895 廣州之役後曾出走到南非，並成立興中會的分會。據馮自由的《華僑革命開國史》：獨有約翰尼士堡埠黨員霍汝丁（字勝剛）於民初返國，曾投資於李其所創辦之江南福羣實業公司，後數年復開設萃文書莊於香港荷理活道 60 號，專經營書籍文具事業。該店至今猶存，南非洲興中會史事，獨此一人知之²¹。《華僑革命開國史》最早於 1946 年重慶出版，也即是萃文到二戰後才結業。而 1935 出版的《中國經濟月刊》當中的英文廣告，也刊有萃文的地址，清楚指明是香港荷理活道 60 號。

Telephone 13187
Sole agents:
Sui Man Book Store, 60, Hollywood Road, Hongkong
American Fountain Pen Co.,
259, Wing Hon Road, North, Canton.
International Bookseller Store
131, Museum Road, Shanghai
Third Floor, The Canton Custom House.

1935 年《中國經濟月刊》第 17 卷中的廣告

荷李活道 60 號現時為建議二級歷史建築，古蹟辦單從建築物的外表估計建於 1920 年代，但事實是否如此？

1920 年 10 月 2 日的政府公報



政府公報 廣告六 十月二日第一千六百六十四號

長春社日前找到萃文存在確實年分最早的文字紀錄，是 1920 年 10 月 2 日由「北洋政府」刊物《政府公報》的廣告，香港萃文書坊是《實用開鑛全書》全國分銷商之一。另一分刊物《外交公報》第五期，錄有 1921 年 8 月 7 日駐南非洲領事館報告的《南斐洲華僑籌設專售國貨公司並所擬簡章》。報告中的東方商業有限公司，總店設在「周漢尼士備格」即約翰尼斯堡。簡章第十七條提到暫借萃文書莊為駐港通信處。

華仁書院（當年稱為華仁英文學校）則是由徐仁壽在 1919 年 12 月於荷李活道 60 號三樓創立，當時學生只有四人，翌年學校擴充至四樓，到 1921 年農曆新年之才後才遷出²²。而萃文最遲 1920 年已經開業，可證華仁和萃文是在同一幢樓宇，而建築物在 1919 年底已存在，有一百年左右的歷史。

按馮自由的說法，也可推斷萃文開業的時間可能更早。霍汝丁投資的福羣實業公司由同盟會員李其創辦。李其，原名祺初，字不生，自號介齡，1872 年左右²³出生廣東陽江縣，大約二十歲時因他的家遭土豪欺凌而到香港，得父執李煜堂（馮自由外父）幫助到葯材行打工，其後到三藩市發展，1910 年初在美國加入同盟會，同年秋賣掉在美的

²¹ 馮自由，《華僑革命開國史》，商務印書館，1946 年，第 117 頁。

²² <http://web.wahyan.edu.hk/index.php/stories-of-wyhk>

²³ 據朱執信為李其寫的墓志銘《李祺初君舊壙志》，李其死時四十三歲；李死於 1915 年，

產業回到香港。1911年春負責粵港聯絡事務，後任《中國日報》經理。李萁在1912年春夏間創辦福羣實業公司時，得李煜堂和霍汝丁等人投資²⁴，可見霍氏在民元已經返國，在後數年開設萃文，按理也不過1920年。而按日後的歷史發展，霍氏等黨人也不可長留內地，因1913年7月爆發「二次革命」和「討袁戰爭」，8月親袁的龍濟光進佔廣州，並開始緝捕黨人，黨人難以在內地立足，孫文自己也要東渡日本，並在年9月成立中華革命黨。李萁參加了在廣東一帶的抗袁武裝行動，並在1915年1月3日獲任命為革命軍廣東游擊隊司令²⁵，可惜的是他在同年11月因病和自軍的炸彈意外爆發的碎片所傷而死亡。1917年2月，朱執信發起募助李萁歸葬費，孫文和霍汝丁也是發起人之一²⁶。霍汝丁和李萁是姻親，霍的女兒嫁了給李萁的長子李伯駿。

霍汝丁曾去信中華革命黨總部，發起設立該黨的駐香港聯絡處，該信未有註明年分，只標明是五月卅日寄出²⁷。此外，霍汝丁也在1923年4月20日被委任為南非洲中國國民黨支部宣傳科主任²⁸。

霍汝丁在政治上沒有多大影響，但他所開設的萃文書坊，則在香港的文化和文學史上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是香港唯一全面銷售因新文代運動所衍生書刊的地方。

據原名岑卓雲的小說家平可（1912-2013）憶述：

「除了商務印書館的香港分店外（該分店只賣上海總店出版的書籍），當時售賣新文藝書籍的書店只有設於荷李活道的萃文書坊。該店的規模不大，初期售賣新文藝書籍只是嘗試性質，來貨很少。不料快就出現求過於供的現象。以後來貨量漸增，而包括我在內的長期顧客也陸續增加。

...關於雜誌，北京和上海出版的期刊也陸續在「萃文」出現，例如魯迅和周作人兄弟所主編的《語絲》，立達學園主編的《一般》，徐志摩等主編的《新月》，林語堂主編的《論語》等等。

...萃文書坊所售賣的雜誌越來越多，我買也買不了，有些雖然買了也沒有時間去詳細閱讀。但其中有一本相當別緻，名叫《幻洲》。它的尺碼比其餘小，封面設計也別出心裁。內容分兩部份，分別稱為象牙之塔，十字街頭。前者由葉靈鳳主編，後者由潘漢年主編²⁹。」

平可說他最初在香港買不到魯迅的《吶喊》和《彷徨》（兩本都是在北京出版，因此香港商務印不會出售），



荷理活道 60 號現貌。

²⁴ 馮自由，《革命逸史》，新星出版社，2009年，第609-611頁。

²⁵ 《國父全集》，第八冊，第26頁。

²⁶ 《國父全集》，第九冊，第586頁。

²⁷ 黃季陸編，《中華革命黨史料》，《革命文獻》第45冊，1969年，第706-709頁。

²⁸ 《國父全集》，第八冊，第473頁。

²⁹ 平可，《誤闖文壇憶述》，《香港文學》，第二期，1985年2月，第99頁。

要靠他在廣州的朋友才看到《阿Q正傳》的油印小冊子。他後來終於在萃文買到魯迅的兩本書³⁰。

原名李霖的本地作家侶倫（1911 - 1988）在他的《向水屋筆語》中對這間書店有詳細的描述：

「...除了基本上發售學校課本和文房用品外，同時兼售新文化書籍和屬於思想性雜誌，成為香港最先也是唯一向本地讀者介紹新文化的書店。

...它的門面和儀表和內部陳設，都是它的同行中最不講究的一家。

...主持這家書店的是兩父子，因為店子小，根本用不上夥計，老闆（父親）是個年老的基督教徒，他平日總是穿著過時的洋服，襯衣外面照例加一件背心，結著陳舊的領帶，配合了斑白的頭髮和上唇一撮不加修飾的鬍子，看上去就像一個落魄紳士的模樣。這老人家有着飽歷風霜的一種憤世嫉俗的態度和孤僻的性情。他對當時中國政治上爭權奪利的「時局」極表不滿，碰上熟悉的顧客買書而有所感觸時，常常會咕嚕幾句牢騷話。聽說這老闆原來是『同盟會』老同志，（他的書店裏掛有一幅孫中山像）早年參加過革命工作，可能還當過『民國官』。

...你要買到當時最流行的新文學組織（如創造社、太陽社、拓荒社之類）的刊物，只有到『萃文書坊』去，就是一切具有濃厚思想性而其他書店不肯代售的刊物，它也在半公開地銷售；只要熟悉的顧客悄悄的問一聲什甚刊物第幾期到了沒有，老闆就會親自從一個地方拿出來。還有難得的一點是，那時候賣新文化書籍和思想性刊物的，在他可說是獨市生意，可是他並不以奇貨自居，價錢仍舊照當時的『大洋』伸算港幣，甚至那些半公開出售的東西，也不額外收費。

萃文書坊後來由老闆的兒子主持。到了戰爭結束營後，書店關門了³¹。」

萃文要半公開地售賣新文化刊物的原因，大約在 1903 年出生的前慶保中學校長陳謙回憶道：「...在荷李活道萃文書坊販賣新文化書籍，雖然時被警察查究干涉，沒收書籍不少，但新書一到，讀者聞風而動，搶購一空，仍能戈獲大利。³²」陳謙是慶保中學創校校長陳慶保的長子，住在當時荷李活道 54 號校舍中，離萃文很近。

萃文出售的雜誌，包括了由中國共產黨初期出版的《向導》和《政治生活》³³。此外，本港出版的文學雜誌也有代售。筆名李燕的詩人李育中回憶，1934 年他們出版《詩頁》雜誌，因侶倫的建議而拿去萃文、良友代售³⁴。

在大陸，新文化運動因五四運動而引發，但香港對新文化運動的關注卻不是因為五四動動。在香港確有罷買日貨轉用國貨的行動，例如 1919 年 6 月間學生的「雨傘運動」，當年 6 年 3 日上午 11 時，有九名就讀歌賦街 33 號 3 樓陶英學校的學生各手持油紙傘一把到街上遊行，傘上用

³⁰ 同上註。

³¹ 侶倫，《向水屋筆語》，三聯書店香港分店，1985 年，第 5-6 頁。

³² 陳謙《「五四」運動在香港的回憶》，《廣東文史資料》第 24 輯，廣東人民出版社，1979 年，第 45 頁。

³³ 王曉嵐，《中共早期黨報發行研究》，《中共黨史研究》，2006 年，第五期，第 42 頁。

³⁴ 《三四〇年代香港新詩論集》，第 138 頁。

白油寫上「國貨」大字，結果在滅火局（即現錦安大廈）前被捕，帶往中區警署。警察拘捕學生的理由是持傘遊行等於巡遊，須得到華民政務司發出的牌照才可，其後更加控因傘上「國貨」二字為若人矚目的標貼，同樣也要向華民政務司領取執照³⁵。在學生被捕後，中國製油紙傘在香港學生當中的銷路好了很多，有學校的學生共買入數百把³⁶。而被控的九名學生當中八名遭警戒了事，但帶頭遊行，年紀最大的伍秉德，則要罰款十元³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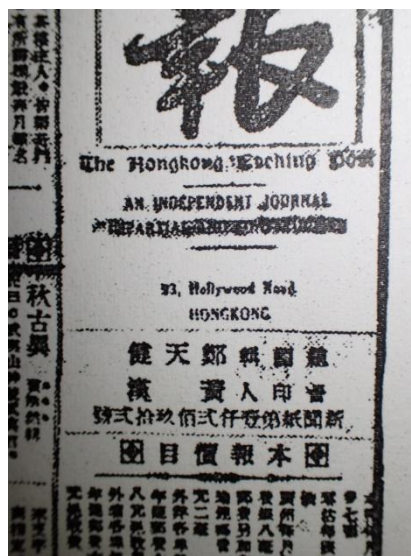
香港新聞一

●學生持雨傘遊街案續訊 歌賦街卅三號三樓陶英學校之學生九名即陳榮生陳保常黃福澤司徒梓創司徒長信麥柏泉陳柏芬凌汝創及伍秉德等被控於本月三號上午十一點手持油紙雨傘用白油大書國貨二字聯道遊行各街道有如出會未先向華民政務司署領取執照一案送誌前報至七號禮拜六上午連裁判司開第二次研審正警察司胡樂甫為政府主控廖亞利馬打律師為被告等各學生辯護是日鐘鳴十點旁聽席位已滿迨至正午裁判署前後左右擁塞不通因各書院及學校放學時各學生均挾書前往觀之故中環警署值日警員以人數太多不能不加限制乃命將裁判署前後鐵閘關閉各學生之遲到乃無從入最奇者中有冒認係被告而強行闖入者守衛問之則答曰（我係被告點解唔准我入）等語其擠擁殆可想見矣至十二點半官始提審此案堂上為之肅然官陞堂後先向被告律師廖君官言曰此案自前次押候時廖君指出之合法例點本司經再三研究案中（出會）兩字亦以為學生遊行合法與不合法全在乎在通衢大道上舉動適當與不適當就以是案而論本司不敢謂學生如此作為得為合法舉動也所以本司以前次廖君提出之例點為然廖律師曰憲台何所據而不然余信得各學生係聯隊而行自始至終未得作為犯法就以主控一方面口供而論實不足為余一駁價值但有人以此案為別開生面之案情本律師惟有請憲台再次押候以便傳訊各証供而已胡警司起曰未審廖君有何証供之可傳余覺得甚詫異也廖君曰何詫異之有不過次第傳各學生上堂指出當日并非與遊行類似出會之例點有抵觸務滿憲台之意為耳耳胡警司曰比不外次第傳全案

不過，據學者陳學然的研究，五四運動對香港「大的迴響或衝擊基本上可以說是不明顯的，也不能算是持久的³⁸。」而據平可的回憶，當時平可所讀的育才書社因 1925 到 26 年的省港大罷工參與罷課，因此引起了平可對時事和新文學的興趣³⁹。

研究香港報業發展的楊國雄指，香港第一家晚報，《香江晚報》的報社最初在萃文書坊上⁴⁰。其後在 1924 年搬到干諾道⁴¹。不過楊國雄並未提供任何證據，支持《香江晚報》創刊時的社址就在萃文樓上。他指報社由萃文遷到干諾道再遷到卑利街，但該文刊出的 1926 年的報頭，社址則是在荷李活道 93 號（印刷不清，但一定不是 60 號）。而 1924 年華字日報的報道，指荷李活道報社的鋪主收回鋪頭是希望重新建築，《香江晚報》報社最初在萃文的可能性可謂微乎其微。

香江晚報報頭



³⁵ 《華字日報》，1919 年 6 月 9 日。

³⁶ 《華字日報》，1919 年 6 月 10 日。

³⁷ 《華字日報》，1919 年 6 月 13 日。

³⁸ 陳學然，《五四在香港》，中華書局，2014 年，第 135 頁。

³⁹ 平可，《誤闖文壇憶述》，《香港文學》，第一期，1985 年 1 月，第 98-99 頁。

⁴⁰ 楊國雄，《香港第一家晚報——〈香港晚報〉》，載《香港掌故》第十一輯，廣角鏡出版社，1987 年

⁴¹ 《華字日報》1924 年 7 月 14 日。

楊衢雲常被指為是興中會首任會長，但首任會長應是黃詠襄⁴²。楊衢雲是在廣州之役前才當上會長。1899 年底孫文成立了「忠和堂興漢會」⁴³，三合會和哥老會推舉孫文為會長，孫文其後向楊暗示，一會不能有兩個會長。楊於是辭去興中會會長一職，並推孫文為會長⁴⁴。

廣東政府在 1900 年 11 月 23 日透過英國駐廣州領事向香港政府要求引渡楊衢雲⁴⁵，但遭香港政府婉拒⁴⁶，因此廣東政府才要「跨境執法」利用暗殺手段。

楊衢雲所住的結志街 52 號在結志街和鴨巴甸街交界，在樓宇後有一小巷名三家里。楊衢雲租住的一樓有兩房一廳，他當時以教英文為生，大廳用作課室之用，近結志街，兩間房則近三家里。由於樓宇建在斜坡上，在三家里只要走一小段樓梯便可到楊所住的一樓。

楊衢雲



企圖殺死楊的兇徒有十人，1901 年 1 月 10 日傍晚，他們分三批到楊家，而實際行事的是首先到達的童祥、陳林仔、徐福和李桂芬四人。他們在和風街出發，很大機會沿皇后大道而行，最後經歌賦街再上鴨巴甸街到達。李桂芬先由三家里上樓觀察情況，之後回到街上，其後陳林仔和童祥到楊衢雲的家中行兇，而徐福在結志街和鴨巴甸街交界把風、李桂芬則守在樓下梯間⁴⁷。雖然陳林仔和童祥一同走進結志街 52 號內，但真正行兇的只有一人。兇手年約 30 歲，5 呎 8 吋高、黑膚色、中等身材，行兇時身穿深藍色外套。根據陳林仔的弟弟日後在法庭上的證供，真正殺死楊衢雲的是陳林仔⁴⁸。

據楊衢雲本人和他學生的口供，案發時間約為下午 6 時 10 至 15 分，當時楊正在教學，陳林仔一言不發走到他的桌旁，開了三至四槍，楊向前倒在書桌上，學生則驚慌四逃，陳林仔也趁混亂逃走。楊的一位陳姓朋友在 6 時 40 分到中央警署報案，警方到現場

⁴² 馮自由，《革命逸史》，新星出版社，2009 年，第 823 頁；又據宋居仁的回憶，黃雲湘被選為會長，楊衢雲為財政，黃雲湘可能是黃詠襄之誤，見《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第九冊，正中書局，1965 年，第 464 頁。

⁴³ 「忠和堂興漢會」這名字幾乎不見於中文的第一手資料中。宮崎滔天的自傳《三十三年の夢》以伏字作「○○堂○○會」，見平凡社出版的《宮崎滔天全集第一卷》，第 155 頁；其《清國革命軍談》作「忠和黨」，全集第一卷第 272 頁；《支那革命物語》作忠和堂，全集第一卷第 415 頁。日人平山周的《中國秘密社會史》，指「興漢會」成立光緒二十五年，即 1899 年，見平山周，《中國秘密社會史》，商務印書館，2011 年，第 172 頁。

⁴⁴ 謝贊泰在 1922 年 8 月 9 日刊登於士蔑西報給孫文的公開信中指，他是在 1898 年 3 月勸楊辭去興中會會長一職；但在 1924 年出版的《中華民國革命秘史》中，則指楊衢雲是在 1900 年 1 月 24 日到香港時告訴他孫文暗示叫他辭職的事。由於興漢會在 1899 年底組成，謝不可能在當年 3 月便勸楊辭職；另謝在書中錯把興漢會寫成同盟會；但考慮到興漢會的神秘色彩（見上註），謝在當時不知道興漢會之名，一點不足為怪。

⁴⁵ CO 129/305 p.502-504.

⁴⁶ CO 129/305 p.517.

⁴⁷ CO 129/317 p. 507.

⁴⁸ CO 129/317 p. 501.

時，楊已到政府公立醫院求醫。醫生在楊的體內取出三顆子彈，楊在 1901 年 1 月 11 日早上因內出血過多而死去。

童祥、陳林仔、徐福和李桂芬四人事後沿鴨巴甸街往海旁逃去，童祥、陳林仔和徐福三人上了一艘舢舨，李桂芳之後出現在油麻地他朋友的艇上，希望能收留他，但遭拒絕。四人後來都到了廣州。

第七站 行刺楊衢雲集結點 善慶街一號

負責在香港替廣東政府打點暗殺楊衢雲的，是原名吳瑞生的吳老三。他曾和駱克一同考察新界，準備香港政府的接收工作，吳老三在 1901 年 1 月 4 日由香港到廣州，見了李家焯和廣東布政使丁體常，丁體常指使吳老三安排殺死楊衢雲⁴⁹。殺手在 1 月 7 日由廣州到港，包括童祥、陳林仔和徐福等人。這批殺手均是廣東政府的低級人員。他們聚會的地方有香港善慶街一號李桂芬的家和吳老三在上環和風街的家⁵⁰。

廣東政府一名楊姓砲艇管帶曾到李桂芬的家，說緝捕委員李家焯想殺死楊衢雲，問李桂芬可否找人行兇，事成後可得一萬至二萬元的獎金⁵¹。由於善慶街一號很近結志街 52 號，李桂芬等人曾利用該屋監視楊衢雲。1 月 9 日陳林仔和另一人也在李桂芬家，商量如何殺死楊衢雲。

童祥、陳林仔、李桂芬事後和得二千元獎金，徐福所得不明。

謀害楊衢雲的只有李桂芬一個受到法律制裁。渾名「哨」的李於 1903 年 4 月 5 日在香港被捕，同年 5 月 20 日和 21 日兩日經審訊後被裁定有罪，於 6 月 17 日在香港被絞死。不過，其他涉案人士多不得善終，原名 Chan Tai On 的陳林仔為廣東政府所殺。1901 年 12 月，陳林仔的遺孀到香港，告訴楊衢雲的友人陳已被清政府斬頭，原來梅合理在 1901 年 9 月曾寫給陳林仔⁵²，希望他能回港作證，但信件被清廷搜出，結果他在 9 月 25 日被殺，英政府相信陳的被害是吳老三在背後策劃。據聞梅合理在信中表示陳林仔如果願意到香港作證，可獲賞銀五百，更可在香港警隊「充三畫之職⁵³」。童祥在 1904 年 8 月或 9 月遭清廷斬首。李家焯因事被貶蒙古⁵⁴。吳老三在 1901 年 10 月 3 日被港英政府出境。香港政府曾討論要求清政府逼德壽下台和賠償楊衢雲的遺族，但因德壽在 1903 年去世，賠償的事不了了之。涉案人士中只有徐福一人的下場不明。

⁴⁹ 據江恭喜同鄉的口供(CO 129/305, p. 526)，另楊衢雲的口供更指是江恭喜告訴他，是「丁藩台」和吳老三合謀想殺他(CO 129/305 p. 534)。藩台，即布政使的別稱。

⁵⁰ CO 129/317 p.516, CO 129/305 p.526.

⁵¹

⁵² CO 129/312, pp. 175-176.

⁵³ 《華字日報》，1911 年 8 月 16 日。

⁵⁴ CO 129/324 pp. 355-356

《中國日報》為興中會的機關報，在 1899 年創辦，社址最初為士丹利街二十四號。到 1901 年遷永樂街（門牌號碼不詳）⁵⁵，1904 年，《中國日報》財政困難，由李紀堂出資五萬元，透過容星橋的關係和文裕堂印務公司合併，報社遷荷李活道⁵⁶。馮自由沒有說明荷李活道報社的門牌號碼，但幸好當年的《中國日報》仍然存在，可以從報頭看到門牌號碼為 92 至 94 號。

內地 省佛陳滬 北地 廣州灣 梧州 江門 澳門 福州 上海 南昌 汕頭 廈門 膠州 漢口 天津 北京 外埠 小呂宋 台灣 星架坡 南美洲 納他 橫濱 神戶 東京 金山 溫哥華 烏約 新金山 暹羅 檳榔嶼 昔有代理依期不悞	<h1>報日國中</h1> <h2>"China"</h2>	日行行情晨派 每逢禮拜停派 每月價銀六毫 每年價銀六員 閱月照加 郵外費長年五員 費寄無澳佛省
No 1210. Wednesday, 16th. MARCH 1904, Nos. 92 & 94, Hollywood Road, Hongkong.		
號拾壹百貳仟壹第紙聞新 叁拜禮 日拾叁月正年辰甲		

1905 年同盟會成立，香港分會在《中國日報》的報社成立，即在荷李活道 92 至 94 號，同盟會的會所，也就設在社長室內。之前則在孫文由日本乘船到越南過境香港時，在船上由孫文主持宣誓儀式。初期由陳少白任分會的會長，鄭貫公為庶務，馮自由為書記。香港分會須兼西南各省軍務黨務和海外各地交通事務。

1906 年初，報社遷到上環德輔道（門牌號碼不詳）⁵⁷，到了 1906 年文裕堂破產，馮自由向他的外父李煜堂求助，得五千元從文裕堂購回《中國日報》，由馮任社長，同年秋報社再遷德輔道 301 號⁵⁸（由於德輔道西在 1907 年 8 月門牌有大幅改動，301 號即現時的 169 號）。1909 年冬，同盟會南方支部成立，由胡漢民任支部長，和香港分會劃分權限，西南各省黨務和軍務改由支部管轄⁵⁹。而《中國日報》因縮減開支，在同年冬搬到荷李活道 231 號（現址）。1910 年春，馮自由到加拿大任《大漢日報》主筆，辭退社長一職。1911 年廣東獨立後，報社移到廣州，到 1913 年中龍濟光主粵，遭封禁停刊⁶⁰。

第九站 同盟會招待所

堅道 70 至/或 72 號 (現 136 至/或 138 號)

香港同盟分會成立初期，孫文曾派胡漢民和汪精衛協助馮自由。由於 1907 年進行了多次軍事行動，同盟會很多成員來港，香港分會在這年先後設立了多個招待所，據馮自由在《中國革命運

⁵⁵ 馮自由，《革命逸史》，新星出版社，2009 年，第 59 頁。

⁵⁶ 同上註，第 60 頁。

⁵⁷ 同上註，第 61 頁及第 536 頁。馮自由在《陳少白時代之中國日報》一文中指：（乙巳年）「十二月，《中國日報》復由荷理活道遷至上環德輔道（第 61 頁）」；在《香港同盟會史要》中，則指：「丙午春從荷理活道遷至德輔道（第 536 頁）」。由於乙巳年的舊曆十二月即 1906 年的一月，因此報社應在當年初搬遷。

⁵⁸ 同上註，第 62 頁。

⁵⁹ 馮自由，《中國革命運動二十六年組織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48 年，第 199 頁。

⁶⁰ 馮自由，《華僑革命開國史》，商務印書館，1946 年，第 10 頁。

動二十六年組織史》一書回憶，招待所包括堅道 70 號⁶¹（堅道在 1925 年遭改動門牌，現為堅道 136 號）、摩利臣山道 27 號（現址）、皇后大道馬伯良藥店四樓、普慶坊、灣仔和進教圍。其中堅道 70 號由胡漢民夫婦主持。後來胡漢民到河內參與鎮南關之役，招待所搬到摩利臣山道 27 號，由胡漢民的太太陳淑子主持。此外，馮自由在《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提到，1907 年 10 月日本人萱野長知替同盟會在日本購買軍火，以商船運送，原計劃在汕尾接手，但中途失敗，船行經香港中途停泊時，萱野、馮自由和胡漢民等在堅道 72 號（現 138 號）同盟會機關部開會討論補救方法，決定在惠州平海再接再械，但又失敗。軍械原船回日本時，遭日本方面扣押⁶²。未知兩者是否同一幢建築物還是馮自由記憶有誤，或真是兩幢雙連建築，一是招待所，一是機關部。

第十站 支那暗殺團總部 摩羅廟街 23 號

支那暗殺團由劉思復在 1910 年創立。劉思復原名劉紹彬，生於 1884 年香山縣城。劉氏是當地大族，居住的地方有池塘樓閣，因此被稱為「水樓」。劉思復有兄弟姊妹十三人，他排行第四，他們當中後來受著劉思復的影響而參加了無政府主義的活動⁶³。

劉思復在 1904 年春到日本留學，1905 年秋加入了剛在東京成立的同盟會，1906 年夏到香港，任《東方報》主筆⁶⁴。《東方報》是鄭貫公死後，《有所謂報》改組而成，社址仍設在荷李活道 79 號⁶⁵。《東方報》創辦人之一易次乾和安懷女學校長鍾芬庭熟悉，劉思復也經易的介紹在安懷女學教授文史，因此認識了鍾芬庭的助教丁湘田，二人開始交往⁶⁶。安懷女學的地址為結志街

1909 年劉思復出獄後攝於香港



11 號，校長鍾芬庭即日後嶺南大學校長鍾榮光的妻子。丁湘田後來也成為暗殺團成員。另一位暗殺團日後的成員謝英伯也因易次乾關係在《東方報》任記者和在安懷女學教書。

1907 年春馮自由、李紀堂、汪精衛在中環普慶坊設立了同盟會的機關，當時同盟會已決定暗殺廣東水師提督李准，劉思復願意執行，並得馮自由和汪精衛的同意，初時在《中國日報》報

館四樓製造炸藥，後移到普慶坊，並在李紀堂的青山農場進行投彈實驗。當一切準備就緒，劉思復便到廣州實行計劃。可惜的是 1907 年 6 月 11 日，劉思復在廣州舊倉巷鳳翔書院的宿舍準

⁶¹ 馮自由，《中國革命運動二十六年組織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48 年，第 139 頁。

⁶² 馮自由，《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 年，第 350-354 頁。

⁶³ 劉石心口述，《關於無政府主義活動的點滴回憶》，載葛懋春編《無政府主義思想資料選》，北京大學出版社，1984 年，第 927 頁。

⁶⁴ 馮自由，《革命逸史》，新星出版社，2009 年，第 1111 頁

⁶⁵ 據《有所謂報》報頭。

⁶⁶ 謝英伯，《人海航程》，載《革命人物誌》第十九集，第 308 頁。

備炸彈時受傷，警察入內搜查時被捕。劉思復那時化名李德山，原因是李德山也有分製造炸彈，當時正回廣西；李德山之名見報時可以提醒他已事敗，不要再回廣東。劉思復也在這次事件中，失去了左手。劉思復在香山監獄在囚其間，丁湘田曾到他的家中，透過劉的弟弟劉石心交信給他，說會設法救他，但被劉思復拒絕⁶⁷。

劉思復最終在 1909 獲釋，之後到香港住在捷發號四樓的同盟會會所。1909 年汪精衛在黃泥涌道成立暗殺團總部，次年暗殺清攝政王載灃失敗被捕。劉思復於是決定自組暗殺團，在 1910 年初成立支那暗殺團。成立之時總部位置有不同說法，據團員李熙斌說，是在般含道 16 號⁶⁸，但團員鄭彼岸之弟鄭佩剛指是羅便臣道⁶⁹，簡又文根據高劍父口述更說是赤柱⁷⁰！三者當中以李熙斌所說較為可信，李為正式團員，和陳炯明同日由廣州來港一同加入。而鄭佩剛是團員鄭岸父之弟，鄭岸父當時在北京，要到後期暗殺廣東將軍鳳山後才南下加入暗殺團，鄭佩剛說他當年在香港美孚火油公司做工，因年紀尚輕而任暗殺團的交通員，團員通信寄到他處代轉，而有人到訪，也要經他安排。要肩負如此重任，對不是正式團員的他根本不可能，而且李熙斌生於 1892 年⁷¹，當年才 18 歲；而鄭佩剛生於 1890 年，比李還要大，怎可能因年紀問題不讓他入團？



1901 年時玫瑰庄西座的門牌為 12 號，但 1910 年時已改為 16 號。

暗殺團得以在般含道租屋是得留日海軍學生蕭楚璧捐助百元而得⁷²，活動經費則由李希斌把房產向十三行借押而得⁷³，陳炯明亦有捐助。當年的般含道 16 號為玫瑰庄西座⁷⁴（Rosa Villa West），即現時般含道 66 號的位置。玫瑰庄同時是拔萃女書室（即現在的拔萃女書院）在 1899 年成立的地方，初時只有 20 名學生，到 1905 年增加至 83 名，1912 年才搬到九龍現址⁷⁵，以此看來拔萃女書室當時可能是在東座。

暗殺團的正式成員包括劉師復、朱述堂、謝英伯、陳自覺、高劍父、程克。數日後陳炯明和李熙斌由廣州到香港，也加入了暗殺團。之後加入的有林冠戎（後改名林冠慈）、丁湘田、鄭岸父（後名彼岸）和梁倚神前後共十二人。謝英伯指團員以年齡排序，他最年長稱大哥。但這說法絕不可信：他在 1882 年出生，陳炯明（生於 1877）和高劍父（生於 1879）年紀要比他大。

⁶⁷ 劉石心口述，《關於無政府主義活動的點滴回憶》，載葛懋春編《無政府主義思想資料選》，北京大學出版社，1984，第 929 頁。

⁶⁸ 李熙斌，《清末支那暗殺團紀實》，《廣東文獻》，第一卷，第三期，1971 年，第 106 頁。

⁶⁹ 鄭佩剛，《劉思復之暗殺活動》，《紀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史料專輯》

⁷⁰ 簡又文，《革命畫家高劍父——概論及年表》，傳記文學，第二十二卷，第二期，第 87 頁。

⁷¹ 李熙斌，《清末支那暗殺團紀實》，《廣東文獻》，第一卷，第三期，1971 年，第 105 頁。

⁷² 馮自由，《革命逸史》，新星出版社，2009 年，第 763 頁。

⁷³ 施正甫口述，《三二九廣州起義的回憶》，載《廣西文史資料選輯》，第十輯，1981 年，第 21 頁。

⁷⁴ *Index to the Street, House Numbers, and Lots in the Colony of Hong Kong*, 1910, p4. 玫瑰庄中文名稱據 1884 年 7 月 12 日香港政府憲示第二百五十一號。

⁷⁵ Susanne Hoe, *The Private Life of Old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212.

暗殺團的入團儀式，是要想入團的人一個人在黑暗的房間中對著骷髏一段時間⁷⁶。暗殺團在油麻地設分機關收取預備團員，徐宗漢、李應生（徐宗漢是他姨母）和宋銘黃（後為高劍父之妻）為預備團員。而李熙斌在分機關製炸彈，拿到青山農場試驗。後來為了節省費用而裁撤分機關，1910年7月，總部也遷至摩士忌街23號⁷⁷。據為陳炯明編寫年譜的陳演生指出，暗殺團「機關設摩囉廟」附近⁷⁸，摩士忌街其實即摩羅廟街 Mosque Street 的音譯。

暗殺團共有三次行動。第一次在1910年秋由程克負責行刺載灃，但程克後來變節，沒有成事。第二次在三二九之役後，在1911年8月13日由正式團員林冠慈行刺李準於廣州，李準重傷，但林冠慈也喪命，而另一執行員陳敬岳也被清兵所捕而犧牲。第三次為武昌起義之後，1911年10月25日由李佩基（即李援）成功行刺廣東將軍鳳山。李佩基當時雖然由黃興派來，但他似乎是支那暗殺團的預備團員；李佩基為李應生之弟，莫紀彭有他在油麻地分機關入團的描述⁷⁹。

廣東在1911年11月宣布獨立後，暗殺團成員齊集廣州，葬林冠慈於紅花崗。李熙斌其後跟隨北伐隊出發，任炸彈營營長。1912年初劉思復、鄭岸父、丁湘田到了上海，同行的還有莫紀彭，李熙斌隨後亦至⁸⁰，準備到北京行刺袁世凱，但汪精衛此時出獄，和團員在南京會面，汪指當時正南北議和，阻止他們前行。團員回廣州時決定把暗殺團解散。

《華字日報》1911年11月10日廣東獨立新聞

駐湖北之北軍無門志不肯與民國軍開戰
駐十省離省城電云
十九日集議離局決議臨時軍程十條併樹新
國旗都督印張敬岐離濟光均辭職公舉胡
衍鴻為都督將軍軍政長現暫代理都督是
日懸國旗商民均歡迎刻下大局安定舊日大
小官吏均逃走
廣東新聞
○反對張敬岐 十九日下午十點旅美華僑來
電云報界公會轉粵商會暨民誠張敬岐舉為
都督不公
○獨立告示 昨日張敬岐出示云國勢日危
主獨立現正籌議完全組織官紳軍民同心
大局岌岌多數人民協力不日議妥宣佈在即
定期堅決以昭正式凡我軍民同心愛國切勿
舉動共保大局特示九月十八日午
○大放囚徒 聞南海縣候所所有積押輕
罪男女犯人共二百餘名口於十八日大開
監門王令全地上並監行釋放云

清國廣東師範李學準



至於李準，他在武昌起義後透過港商韋玉的關係和李紀堂聯繫，再透過他和胡漢民談投降的條件。李準的條件是保他人身安全和任民國的陸軍中將，而這兩個條件胡漢民也都答應。一日韋玉宴客，更把胡李的換文拿出來娛賓，上有胡漢民同盟會南方支部的大紅印，莫紀彭看到後大受刺激⁸¹，而這事黃興在南京以陸軍部長身分批准，莫紀彭憶述：「歷史上說過：『陳叔寶殊無心肝』他日若然我與黃胡在黃泉三人相逢，仍要問他二人應作何解！？」莫紀彭更因此決定從此不仕⁸²。

而劉思復在民國初期看見各派之間明爭暗鬥，也使他歸向了無政府主義思想。事實上他在香山入獄期間，已接觸了有關書刊，於是在暗殺團解散後，成立心社和晦鳴學社兩個無政府主義組織，發表心社十二條：不食肉、不飲酒、不吸煙、不用僕役、不婚姻、不稱族姓、不作官吏、不坐轎及人力車、不作議員、不入政黨、不作陸海軍人、不奉宗教。不稱族姓，劉思復此後改稱師復，鄭岸父改稱彼岸，丁湘田稱為扈離⁸³。由於有不婚姻一條，劉思復和丁湘田始終沒有結婚。他們二人關係最甜蜜的是在上海期間，劉、丁、鄭、莫四人同住在別克登飯店，劉、丁二

⁷⁶ 謝英伯，《人海航程》，載《革命人物誌》第十九集，第326頁。

⁷⁷ 李熙斌，《清末支那暗殺團紀實》，《廣東文獻》，第一卷，第三期，1971年，第107頁。

⁷⁸ 陳演生，《陳競存先生年譜》。

⁷⁹ 莫紀彭，《李援傳》，載《莫紀彭先生訪問紀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年，第96-97頁

⁸⁰ 李熙斌，《清末支那暗殺團紀實》，《廣東文獻》，第一卷，第三期，1971年，第111頁。

⁸¹ 莫紀彭，《三年回憶語》，載《莫紀彭先生訪問紀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年，第142頁。

⁸² 同上註，第140頁

⁸³ 劉石心口述，《關於無政府主義活動的點滴回憶》，載葛懋春編《無政府主義思想資料選》，北京大學出版社，1984年，第932頁。

人一間房，鄭、莫二人另一間。初時四人一起共晉早餐，但其後劉、丁二人日上三竿仍不見人，好事的鄭岸父在他們房間窗下窺探，發現他們仍未起床⁸⁴。

可惜好境不常，在回到廣州後，丁湘田已有身孕，而劉思復則有肺癆徵象。晦鳴學社出版的《晦鳴錄》被親袁世凱的龍濟光查禁，先遷往澳門，以《民聲》為名再出版，後再搬到上海。此時劉、丁二人不言不語，劉更拒絕讓丁湘田進入他的房間。劉思復最後因肺病於 1915 年 3 月 27 日在上海逝世。劉思復的弟弟劉石心認為是經濟關係使兩人的關係惡化⁸⁵，但這是對二人的侮辱，筆者相信劉思復是擔心自己的肺病會傳染丁湘田，甚或自己也覺得肺病只會惡化下去而故意疏遠丁湘田；而從丁湘田過去的行為絕不像是為了錢而和劉思復一起。

在劉思復死後，丁湘田仍留在上海，在海寧路三德里冠群女學校教書⁸⁶，她在 1916 年 8 月 20 日加入了南社，介紹人是謝英伯和朱少屏⁸⁷，並參加了 9 月 24 日在上海愚園舉行的第十五次雅集⁸⁸。1917 年 8 月 16 日，中華新報刊登了丁湘田的來函。丁湘田又著有師復隻手勞動記⁸⁹，可惜筆者找不到原書或書文。丁湘田為劉思復育有一女，在南園第十五次雅集的相片中，第一排有一位女士身旁有一小孩，有可能就是丁湘田和她女兒。

南社在上海舉行的第十五次雅集合照，前排左起第七位女士可會就是丁湘田？小圖為中華新報刊登丁湘田的來函。



⁸⁴ 莫紀彭，《回憶師復》，載《莫紀彭先生訪問紀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年，第72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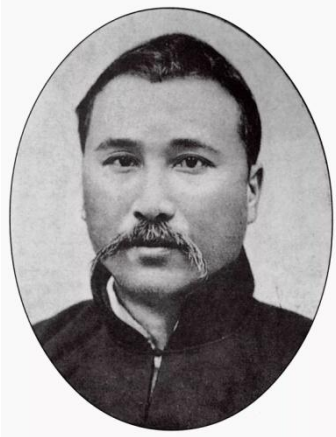
⁸⁵ 劉石心口述，《關於無政府主義活動的點滴回憶》，載葛懋春編《無政府主義思想資料選》，北京大學出版社，1984年，第933頁。

⁸⁶ 陳去病，《南社雜佩》，載《上海文史資料選輯》，第44輯，第152頁。

⁸⁷ 楊天石，黃學莊，《南社史長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427頁。

⁸⁸ 同上註，第429頁。

⁸⁹ 鄭逸梅，《南社叢談》，中華書局，2006年，第413頁。



陳炯明

莫紀彭最後一次見到丁湘田是在 1922 年，當時為廣東省省長的陳炯明有一天從自己口袋掏出不到百元港幣，叫莫紀彭交給廳中客人，那人就是丁湘田。相隔十年不見，丁湘田變得老成，但也健康，收下了不夠百元便走。莫紀彭怪陳炯明寒酸失禮，為廣東納稅人省錢卻得失了朋友⁹⁰。但據時任廣東省財政廳廳長馬育航的女兒馬思琚（音樂馬思聰的八妹）回憶她母親黃楚良所言，陳炯明上台就禁煙、禁賭、禁娼，國家收入一下子沒有了一半，但孫文老是向馬育航要錢，黃楚良曾對她的子女說：「孫文就會車大炮，他在上海每個月生活費有好幾百，你父親是財政廳長，自己家裏吃什麼？黑豆豉生薑燜鱧魚骨⁹¹。」馬育航本身對支那暗殺團也有貢獻，謀炸李準時，曾協助運送炸藥上廣州⁹²。馬育航在陳炯明下台後也到了香港，住在加連威老道 20 號，馬思聰曾在屋內練習小提琴⁹³。1939 年，蔣介石的特務組織藍衣社希望馬育航可以到上海找汪精衛談日本人的事⁹⁴，但最後在上海竟被務藍衣社人員殺人滅口⁹⁵。1940 年馬氏舉家搬到上海。馬思聰則在 1949 年後受周恩來邀請到北京任中國音樂學院首任院長，但在文革中被迫害。因他姓馬，音樂學院的紅衛兵便迫他吃草⁹⁶。在批鬥時一定要說普通話，不許說廣東話⁹⁷。馬思聰最終逃出大陸，在 1967 年 1 月 15 日晚再次踏足香港，其後到美國定居，終其一生⁹⁸。

1922 年也發生了香港海員大罷工，背後是由前暗殺團成員謝英伯組織⁹⁹。在 1921 年 3 月 6 日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海員工會）在香港成立，開幕禮的主席為「孫文代表」。同年 11 月，海員工會向船公司求加薪：當時海員一般的月薪為二十二元，工會要求月薪三十元以下的加薪四成，三十元以上加薪三成。由於船公司不答應工會的要求，工會遂在 1922 年 1 月 22 日下午五時開始罷工，大批海員乘坐火車到廣州，孫文並指示廣州政府所有的廟宇必須開放讓罷工海員住宿¹⁰⁰，廣州政府徵用了深圳的民居為三千名罷工海員提供居所¹⁰¹。香港政府在 2 月 28 日規定華人必須有證件才可出境¹⁰²，但仍阻不了他們離港。3 月 3 日更發生了香港警察在沙田向罷工工人開槍，造死 4 死 8 傷的慘案¹⁰³。最終是廣州英領使傑彌遜獲得陳炯明的幫助，讓海員工會的全權代表連同廣州總商會的代表，在傑彌遜陪同下，在 3 月 4 日到香港和船公司和香港政府談判，到 3 月 5 日下午 5 時達成協議，罷工才結束。

⁹⁰ 《莫紀彭先牛訪問紀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 年，第 74 頁。

⁹¹ 馬思琚口述，《追憶馬家》，載馬瑞雪著，《馬思聰蒙難記》，大山文化，2014，第 262-263 頁。

⁹² 李熙斌，《清末支那暗殺團紀實》，《廣東文獻》，第一卷，第三期，1971 年，第 108 頁。

⁹³ 方寬烈，《香港文壇往事》，香港文學研究社，第 464 頁。

⁹⁴ 馬思琚口述，《追憶馬家》，載馬瑞雪著，《馬思聰蒙難記》，大山文化，2014，第 269 頁。

⁹⁵ 同上註。

⁹⁶ 劉再復，《三個歷史性的「馬思聰時刻」》，載馬瑞雪著，《馬思聰蒙難記》，大山文化，2014，第 iv 頁。

劉再復是馬思聰外孫的丈人。

⁹⁷ 馬瑞雪著，《馬思聰蒙難記》，大山文化，2014，第 3 頁。

⁹⁸ 同上詳，第 219 頁。

⁹⁹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I, From the First to the Second World War. Series G, Africa, 1914-1939, Vol 27, p.139.

¹⁰⁰ Ibid. p.137

¹⁰¹ Ibid. p.31.

¹⁰² Ibid. p.139.

¹⁰³ 《華字日報》，1922 年 3 月 10 日。

香港政府在 3 月 7 日致殖民地部的電報指出，罷工是政治事件¹⁰⁴。根據當時英國駐上海領使法磊斯得到的情報，廣州政府為罷工人士提供食宿是有條件的，他們將來要把薪金增加了的金額的一半交給工會一段時間，作為北伐的經費。而廣州政府只為罷工人士提供十天食物，又拒絕讓工人離開廣州，並指出如果他們要得到食物便要加北伐軍¹⁰⁵。

當時陳炯明就罷工問題和謝英伯弄得不愉快。謝曾要求陳杯葛英國在南中國海的貿易，遭陳拒絕；而陳曾命謝要在 2 月 4 日前解決問題，但謝並沒有理會¹⁰⁶。同時孫陳不和已經十分明顯，香港政府助理輔政司符烈槎在 1922 年 3 月 14 日有關海員罷工的報告上指出：「有很好的理由相信陳炯明不介意趕走孫逸仙，但他認為自己並不強大到可以採取決斷的行動¹⁰⁷。」陳炯明最終因孫文威脅使用毒氣彈對付粵軍，在同年 6 月 16 日和孫文公開決裂。

李熙斌在 1910 年加入支那暗殺團前在廣州就讀嶺南學堂，和簡又文同級。在三二九一役中被捕後獲釋，因此知道李準辦事和休息地點，才有其後行刺李準的行動。暗殺團解散後，就讀蘇州東吳大學，主修生物，於 1918 年畢業，1922 年任嶺南校長室秘書，1925 年任中文系講師，二戰後，到嶺南香港分校任國文教員，到老退休。李熙斌在 1960 年 10 月病逝¹⁰⁸。

中大中國文化研究所前所長陳方正曾就讀嶺南，對李熙斌有下一段有趣的描述：「一頭蓬鬆亂髮，雙眼深陷，臉色枯槁，穿一身色長袍，令人不由得想起魯迅筆下的魏連殳。據說他曾經參與黃花崗之役，所以號七十三烈士，但教歷史卻平鋪直敘，無甚精彩。肅然起敬的一回，是他拿了一冊英文書在翻閱，偷看書名不懂，去查字典，原來是相對論淺釋。極為滑稽的一幕，則是校內盛傳每年 12 月 12 日 12 點鐘，大操場升旗台會有冤鬼出現。那天半夜寒颼颼的，我們躲在窗後屏息而待。果不其然，一個黑影就在對面樹影下踱步，然後雲開月現，黑影一抬頭，臉色慘白，正就是李老師！大家情不自禁，嘩然大叫起來。他氣極了，跑來把我們狠狠訓斥一頓。這是六十多年前的事情了...。想來，烈士暮年面對這群無佑頑童，哭笑不得之餘更必有無限感慨吧。

¹⁰⁹」



¹⁰⁴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I, From the First to the Second World War. Series G, Africa, 1914-1939, Vol 27, p.2

¹⁰⁵ Ibid. p.30

¹⁰⁶ Ibid. p.32

¹⁰⁷ Ibid. p.138

¹⁰⁸ 據簡又文在李熙斌《清末支那暗殺團紀實》一文前的簡介，《廣東文獻》，第一卷，第三期，1971年，第105頁。

¹⁰⁹ 陳方正，《當時只道是尋常》，中文大學出版社，2016，第51-52頁。

灣仔區廣州起義史蹟徑

第一站 革命軍統籌部

黃泥涌道三十五號（現 153 號）

1910 年 5 月黃興和趙聲在香港去信孫文，檢討新軍之役的失敗，同時建議在廣州舉事，「省城得，兵眾械足，無事不可為¹¹⁰」。同年底孫文在檳城和黃、趙及胡漢文等人會面，決定在廣州起義。黃興和趙聲在 1911 年正月中旬（即二月）成立革命軍統籌部，由黃興任部長，趙聲任副部長，同時任行動時的總指揮，但因他在廣州太多人認識，不便露面，故改由黃興先行¹¹¹。

現存文獻多指統籌部在「跑馬地三十五號¹¹²」，未有街道名稱，但從莫紀彭的回憶中把同盟會南方支報跑馬地四號和黃泥涌（道）四號交替使用，可知跑馬地三十五號實為黃泥涌道三十五號。另同盟會成員陸丹林在《革命史譚》的《關於鄒著中國國民黨史稿的幾句話》一文中，更清楚指出「『跑馬地三十五號』恐漏去『黃泥涌道』四字¹¹³。」

不過當時的黃泥涌道三十五號並非現時的三十五號，該處的門牌號碼在 1924 年經大幅變動，35 號改為現在的 153 號¹¹⁴。

除了統籌部，同盟會還在香港設有八個和三二九行動有關的分課，分別是出納、秘書、儲備、調度、交通、編制、調查、總務¹¹⁵，另有實行部在擺花街 12 號。曾參與三二九行動的熊克武憶述，他到香港便是和黃興一起住進跑馬地三十五號，並指出在武昌起義成功後，廣東省政府曾和香港政府交涉，保留所有有關歷史的房屋以為紀念¹¹⁶。熊克武說他不知道交涉結果如何，但從現在一幢不留的結果，可想而知是失敗了。

476 THE HONGKONG GOVERNMENT GAZETTE, SEPTEMBER 12, 1924.

OLD NUMBERS 舊門牌	NEW NUMBERS 新門牌
WONG NEI CHONG ROAD,—Continued. 黃泥涌道 Here is Broadwood Road.	
	97-131 (odd nos. inclusive)
15 十五	133 一三三
17 十七	135 一三五
19 十九	137 一三七
21 二十一	139 一三九
23 二十三	141 一四一
25 二十五	143 一四三
27 二十七	145 一四五
29 二十九	147 一四七
31 三十一	149 一四九
33 三十三	151 一五一
35 三十五	153 一五三
37 三十七	155 一五五

Crown Land. Three blocks of Quarters for Government Officers formerly numbered 18-1 (18 houses).

1924 年黃泥涌道門牌變動

據當時在場的《中國日報》記者陳春生回憶，黃興要到 4 月 23 日才到廣州指揮行動，原定在 4 月 29 日起義。由於懷疑胡毅生所部的陳鏡波為李準派來的奸細，加上廣州周圍有同盟會機關被破獲，黃興在 4 月 26 日早上決定暫援起義，並發電報叫香港的會員不要上廣州，並遣散選鋒隊

¹¹⁰ 《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周年文獻，革命之倡導與發展，中國同盟會四，正中書局》，1964，第 33 頁

¹¹¹ 姚兩平，《追憶庚戌新軍起義和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之役》，《辛亥革命回憶錄》，第二集，新華書店，1962 年，第 291 頁。

¹¹² 馮自由，《中國革命運動二十六年組織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48 年，第 221 頁。

¹¹³ 陸丹林，《革命史譚》，文海出版社，第 33 頁。

¹¹⁴ 1924 年 9 月 12 日憲報第 519 號

¹¹⁵ 《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周年文獻，革命之倡導與發展，中國同盟會四》，正中書局，1964，第 411 頁。

¹¹⁶ 熊克武，《廣州起義親歷記》，《辛亥革命回憶錄》，第一集，文史資料出版社，1981 年，第 131 頁。

員，特別是陳炯明和胡毅生所部人多勢雜的一班。但到了同日晚上，黃興、林時壘和喻紀雲開會，又認為不可改期，黃興在早上開完會人眾人散去後，對身邊的人說：「我既入五羊城，不能再出去。」又曾說：「餘人可邁步出五羊城，惟我黃克強一人必死於此矣。」林時壘也認為事已敗露，但決死之志不可移，即使大舉不成，也可做一場大暗殺。而喻雲紀的反應最為激烈，「如中狂病，四出咆哮，幾於逢人盡罵，謂非幹不可，彼一人亦幹」。陳春生批評，三二九一役，只是黃林喻三人的決志，「吾人做事，不當舉旗不定若此。惟此時在座諸同志，熱度可沸，認定此處為大暗殺，非復為軍事佈置，人數多寡不必計量，臨時能拾回多少便算一回事耳。」



黃興

於是又再發一電給香港，說要在 4 月 27 日舉事¹¹⁷。

任何對於三二九廣州一役的評論，均不應無視以上事實，黃興在事後的致海外同胞書，也清楚寫明是他「令各部即速解散，以免搜捕之禍¹¹⁸。」在 26 日早上解散晚上又再決定行動，香港的統籌部根本準備不及，胡漢民和趙聲也要到 27 日晚才乘船到廣州，但行動已在當日下午五時半開始。胡漢民在 26 日晚曾發電給黃興叫他延期一日；而黃興在 4 月 27 日三時收到香港的來電本來決定延期，但到四時又整裝待發，在當日舉事¹¹⁹。

行動以失敗告終，陳鏡波最後在香港被洪承點和莫紀彭所殺¹²⁰。

陳春生在 1900 年加入興中會，任《中國日報》記者十多年，也以他的資歷最長，收藏有史料最為豐富¹²¹。陳春生有關廣州一役的記錄較其他親歷者的文章客觀冷靜，甚至可以說是一篇新聞報道。這種手法似乎得不到孫文欣賞。容星僑在 1915 年 11 月去信孫文，希望當時的中華革命黨可以出錢印行陳春生的革命史稿，但孫文覆電時竟說：「以陳君春生雖久主筆政，然對革命仍是門外漢。其所收藏不免街談弄語，掛一漏萬，殊不足為革命之史料。本黨不能代為印行，並將原件寄回¹²²。」

第二站 同盟會南方支部-黃泥涌四號(現黃泥涌道 11 號)

同盟會南方支部在 1909 年底成立。支部得以成立，是靠新加入的同盟會成員林直勉要求他在香港經營藤枝店的叔父分回他父親留下的遺產而獲得資金的。林直勉，字紹軒，東莞人，1887 年生¹²³，1909 年初，和同是東莞人的莫紀彭和李文甫組成「醒天夢」劇團，到香港演出，觀眾席

¹¹⁷ 陳春生，《廣州三月二十九發難決定之經過》，載《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周年文獻，革命之倡導與發展，中國同盟會四》，正中書局，1964，第 142-147 頁。

¹¹⁸ 黃興，《致海外同胞書》，《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周年文獻，革命之倡導與發展，中國同盟會四》，正中書局，1964 年，第 248 頁。

¹¹⁹ 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東方出版中心，2011 年，第 799-800 頁。

¹²⁰ 莫紀彭，《毀家報黨三故事》，載《莫紀彭先生訪問紀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 年，第 188-189 頁。

¹²¹ 馮自由，《革命逸史》，新星出版社，2009 年，第 433 頁。

¹²² 《中華革命黨時期函牘》，《革命文獻》，第 48 輯，中央文物供應社，1969 年，第 336 頁。

¹²³ 《廣東文徵續編》，第三冊，第 95 頁。

上有馮自由，其後劇團多人加入了同盟會，並住在捷發號四樓¹²⁴。他們後來和胡漢民會面，知道他正籌組同盟會南方支報，但是欠缺資金，林直勉當時剛過了二十一歲，有權繼承他父親留下的遺產。林的父親早年經營「林榮昌」藤枝店，西營盤的分店由林直勉的叔父打理，於是他找律師要求叔父析產，把他所得那分全數三萬元交給胡漢民成立支部¹²⁵，據當時在場的莫紀彭回憶，支部地點在「跑馬地黃泥涌四號¹²⁶」，但他也有用「跑馬地四號¹²⁷」和「黃泥涌四號¹²⁸」來說明支部的地址。

1924 年黃泥涌道門牌變動

馮自由對南方支部的成立有以下記載：「己酉九月，香港同盟會員以各地黨勢日盛，設議於香港分會之外，添設南方支部，以擴大組織。逐推舉胡漢民為支部長，汪精衛書記，林直勉會計，會所設於黃泥涌道¹²⁹。」可知南方支部的確在黃泥涌道。問題是黃泥涌道當年是沒有雙數門牌號碼的，但當中有個叫 Man Chung Terrace 的地方，把門牌不分單雙分為 1 至 14 號，莫所說的「黃泥涌四號」，應是 Man Chung Terrace 四號。由於該路的門牌號碼在 1924 年經幅變動，當年的 4 號變為現時的 11 號。

莫紀彭回憶，支部成立之初只有十人：胡漢民、莫紀彭、林直勉、李文甫、林時壘、朱執信、陳炯明、洪承點、胡毅生和黎仲實。由於汪兆銘當年要準備暗殺，因此未有就秘書職。莫紀彭、林直勉和李文甫三人為籌餉組委員；林時壘任宣傳；朱執信和陳炯明在支部成立後一月來港也加入了宣傳組；洪承點為軍事組，胡毅生為民軍組¹³⁰。

至於馮自由說的「黨勢日盛」，莫紀彭回憶香港分會能招集到的會員只有二十個¹³¹。

第三站 愉園

愉園除了是香港早年著名的遊樂景點外，也是同盟會成員聚腳的地方。據馮自由的憶述，愉園的擁有人為余育之，為日昌銀號東主，1895 年經楊衢雲介紹加入興中會，資助軍餉「萬數千元¹³²。」1909 年劉思復出獄到香港，同盟會的同志在愉園為他開歡迎會¹³³。同盟會的成員閒時也愛到愉園飲茶¹³⁴。

THE HONGKONG GOVERNMENT GAZETTE, SEPTEMBER 12, 1924. 475

OLD NUMBERS. 舊門牌	NEW NUMBERS. 新門牌
WONG NEI CHONG ROAD,—Continued. 黃泥涌道	
1A 一A	1 一
1B 一B	3 三
Here is a Road.	
1 一	5 五
2 二	7 七
3 三	9 九
4 四	11 十一
5 五	13 十三
6 六	15 十五
7 七	17 十七
8 八	19 十九
9 九	21 二十一
10 十	23 二十三
11 十一	25 二十五
12 十二	27 二十七
13 十三	29 二十九
Here is Sing Woo Road.	

Man Chung Terrace.
(Entrance in Sing Woo Road).

¹²⁴ 《莫紀彭先生訪問紀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 年，第 135-136 頁。

¹²⁵ 同上註，第 141 頁

¹²⁶ 同上註，第 140 頁

¹²⁷ 同上註，第 82 頁

¹²⁸ 同上註，第 141 頁

¹²⁹ 馮自由，《中國革命運動二十六年組織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48 年，第 545 頁

¹³⁰ 《莫紀彭先生訪問紀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 年，第 142 頁

¹³¹ 莫紀彭，《同盟會南方支部之幹部及庚戌新軍起義之回顧》，載革命人物誌，第十二集，第 326 頁。

¹³² 馮自由，《逸經》，第八期，1936 年 6 月，第 45 頁，

¹³³ 馮自由，《革命逸史》，新星出版社，2009 年，第 1120 頁。

¹³⁴ 《莫紀彭先生訪問紀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 年，第 135-136 頁。

愉園地佔有黃泥涌的四個地段（I.L. 1386 1364 1338 1702），英文名稱為 The Happy Retreat¹³⁵。愉園成立確實日期筆者仍未清楚，但 1899 年 11 月 4 日政府憲報載愉園申請酒牌被拒的消息，申請人為 Peter Hayes，之前已持有一年酒牌，則愉園最遲在 1898 年已經開業。Peter Hayes 可能只是余育之的代理人，因申請要經地方法院處理，陪審的法官、太平紳士和警察代表全是外國人，而當日其他申請人也沒有一個華人。

翻查當年的舊報，愉園內有動物園、射擊場等景點，又經常搞展覽和放烟花吸引人人場。陳謙回憶指當年愉園「在跑馬地黃泥涌道賽馬場對面。入門須經一段小斜坡而後達於園內。設有射擊場、鞦韆架，旋轉風車等。旋轉風車使用電力，凌空而上，高處一望，恍似登仙，俄而下降，驚魂始定。在民國初年，廣州尚未有此，故雖收費每次港幣數角，人亦喜乘之。園的兩旁樹木蒼翠，花卉鮮紅，相映成趣。中設石檯藤椅，供應茶點，但僅牛奶，咖啡、紅茶、汽水及西餅，糖果之類。大約茶或咖啡一杯，西餅或餅乾

一碟，需銀一元。那時風氣初開，夫婦携小孩偕遊，亦人生一樂。遊客以政府文員及洋行職員、醫生、教師為多，若星期六下午及星期日常坐無虛位¹³⁶。」

可惜的是 1918 年馬場大火，使黃泥涌跑馬地一帶頓成死城。愉園在 3 月 25 和 26 日舉行法事超渡死難者；而愉園的生意也受影響，要低價變賣地皮，最終在 1922 年 9 月改建為養和療養院¹³⁷。愉園的生意結束後，余育之曾在 1923 年被任命為中央財政委員會委員¹³⁸。當李紀棠在 1921 年任四會縣長時，曾邀請他去處理庶務，李去職後，余育之到上海冠生園酒家當招待員，月薪只有數十元。

第四站 基督教墳場

香港第一個西式墳場在 1841 年在今灣仔進教圍和皇后大道東之間設立。灣仔墳場在 1845 年已爆滿，政府同年在黃泥涌谷開設新的墳場。灣仔墳場的遺體在 1889 年移葬到新的墳場，即現時的香港墳場。香港墳場早年稱為基督教墳場，俗稱「紅毛墳場」。

1895 年余育之支持興中會的軍事行動，便是在該墳場把資金交給興中會首任會長黃咏襄和楊衢雲¹³⁹。楊衢雲當時可能也想不到他在六年後會長埋紅毛墳場的黃土下吧。他的墓一直沒有刻名，

¹³⁵ *Index to the Street, House Numbers, and Lots in the Colony of Hong Kong*, 1910, p107.

¹³⁶ 陳謙，《香港舊事聞見雜錄（三）》，《廣東文史資料選輯》，第 46 輯，1985 年，第 43-44 頁

¹³⁷ 見養和醫院網頁。

¹³⁸ 《國父全集》，第八冊，第 486 頁。

¹³⁹ 馮自由，《逸經》，第八期，1936 年 6 月，第 45 頁，

只有 6348 這編號，直到 2011 年 9 月香港政府才在他的墓旁豎立說明牌。1969 年底，有傳政府當局要把楊衢雲的墓掘起，得守墓人黃之棟寫信給政府才作罷。此外，另一名興中會成員、李陞格致工藝學堂校長鄭華汰也是葬在香港墳場，位置為第一區第二行第三個墓。

第五及第六站 摩理臣山道 27 號會所及鵝頸橋機關

1907 年秋冬間同盟會招待所由堅道搬到了「馬禮遜山道二十七號」，此時胡漢民去了越南，會所由胡的妻子陳淑子主持。據曾參與三二九一役的同盟會成員回憶，在失敗後宋教仁、譚人鳳、陳其美居住的馬禮遜山道機關被清吏得知，請求香港政府警察搜查¹⁴⁰。

除了摩理臣山道的會所外，同盟會就辛亥廣州的軍事行動還有一機關在附近的鵝頸橋，胡毅生開設了頭髮公司，以小包飾頭髮運送子彈上廣州¹⁴¹。但胡毅生所起用負責公司的陳鏡波原來是奸細，把運送子彈和槍支的數目告訴李準¹⁴²。

這機關可能就是莫紀彭所說的「鵝頭橋十號¹⁴³」，鵝頭橋應是鵝頸橋之誤，因他另一篇文章寫作「路馬地鵝頸橋¹⁴⁴」；莫紀彭把這機關誤作統籌部，但他自己也說因為在之前外遊加上在廣州行事甚少回港，所以他根本不知香港除了南方支部外還成立了統籌部¹⁴⁵。據鄒魯所言，吸取了之前只要一機關被破便牽連全局的教訓，這次議定各分機關由主事人負責，各不相問亦不相告¹⁴⁶，因此莫紀彭不知道所有機關的位置不足為奇。



了之前只要一機關被破便牽連全局的教訓，這次議定各分機關由主事人負責，各不相問亦不相告¹⁴⁶，因此莫紀彭不知道所有機關的位置不足為奇。

「鵝頸橋十號」應為堅拿道西，1910 年版的街道、樓宇門牌號數和地段索引只有堅拿道西而沒有堅拿道東的資料。順帶一提 Canal Road West 的中文名稱，索引和現在一樣，叫堅拿道西，1930 年的憲報亦如是，但 1932 年的憲報，則稱為運河道西，可見當時道路中文譯名的混

¹⁴⁰ 《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周年文獻，革命之倡導與發展，中國同盟會四》，正中書局，1964，第 196 頁。

¹⁴¹ 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東方出版社，第 796 頁。

¹⁴² 《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周年文獻，革命之倡導與發展，中國同盟會四》，正中書局，1964，第 2 頁。

¹⁴³ 《莫紀彭先生訪問紀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 年，第頁。

¹⁴⁴ 同上註

¹⁴⁵ 同上註

¹⁴⁶ 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東方出版社，第 783 頁。

亂。根據 1910 年版的索引，當年堅拿道西十號的地段為 IL 1371 s.A. and R.P.，也即是現時堅拿道西和雲西街交界的雲西街 28 號。

鵝頸橋十號很有可能就是林覺民寫下與妻書的「濱江之樓」¹⁴⁷。鵝頸橋十號的對開，就是黃泥涌下游的寶靈頓運河；而林時埭和林覺民同是福建人，兩人在日本籌得軍餉原計劃回福建起事¹⁴⁸，1911 年春天，林時埭收到黃興和趙聲的來信，說大事可為，於是二人一同到香港¹⁴⁹。而莫紀彭就在鵝頸橋十號碰到林時埭¹⁵⁰，則林覺民也應和林時埭在一起。

第七站 馬島醫院 灣仔道

馬島醫院是早年日本人在香港經營的醫院，1909 年時的地址為灣仔道 151 號，到 1925 年 11 月 20 日時門牌變為 191 號，即現時的景星大廈。

馬島醫院是趙聲病逝和陳炯明去世前留醫的地方。1911 年三二九之役由於多次改期，黃興指揮混亂的關係，趙聲和胡漢民 4 月 28 日才抵廣州，那時城門已關，兩人知事敗，胡漢民決定回香港，而趙聲則計劃到順德希望策動當地民軍，到河南鎮時遇到莊六（莊漢翹之弟），莊六告訴他黃興斷指藏在徐宗漢處；趙聲和黃興見面後，兩人慟哭後暈倒，趙聲當晚已發病，由莊六送他回香港¹⁵¹。趙聲回港後縱飲，據莫紀彭回憶，趙聲平時一席間可以盡飲兩瓶百蘭地。5 月 6 日（舊曆四月八日）趙聲腹痛，被送入馬島醫院，醫生斷為盲腹炎，5 月 15 日動手術後說是腸潰癰，16 日吐黑血，神智不清，開始胡言亂語，口呼「黃帝來昭」、「岳武穆來晤」、「出師未捷」等語，到 5 月 19 日去世。據徐宗漢後來告訴莫紀彭，當時是由她認作趙聲妻子，附署開刀；趙聲開刀後，取出的腸，有一節紫藍色，一節全黑色，在傍的人莫不流淚¹⁵²。趙聲死後初時葬於香港的咖啡園墓園，墓碑諱其名，以「天香閣主人之墓」代之，民國成立後移葬鎮江的竹林寺。



趙聲

在六一六事件後，陳炯明的殘部在 1925 年被完全擊敗，陳氏此後以香港為他的主要居住地。1925 年，美國致公堂改組為中國致公黨，由陳炯明任總理。陳炯明初時在樂活道租屋，1933 年 8 月 18 日，因腸炎入灣仔的馬島醫院治理，9 月 21 日後搬到在毓秀街 25 號的「定廬」居住，次日病逝，治喪處就設在樓下。他的家人其後遷到毓秀街 27 號。

¹⁴⁷ 《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周年文獻，革命之倡導與發展，中國同盟會四》正中書局，1964 年，第 448 頁

¹⁴⁸ 革命文獻六十七，第 276 頁。

¹⁴⁹ 《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周年文獻，革命之倡導與發展，中國同盟會四》正中書局，1964 年，第 196 頁。

¹⁵⁰ 《莫紀彭先生訪問紀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 年，第 89 頁。

¹⁵¹ 《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周年文獻，革命之倡導與發展，中國同盟會四》正中書局，1964 年，第 428 頁

¹⁵² 《莫紀彭先生訪問紀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 年，第 89 頁

第八站

東海旁 76 號(現莊士敦道 190 號)



馮自由於 1905 年由日本到香港，1906 年接手《中國日報》和當選同盟會香港分會會長，《中國日報》報社四樓分為前半馮自由一家居住地方和後半社長社，為同盟會總部。因其後分會採門戶開放政策，招攬會員，引起警察注意，1909 年春馮自由舉家遷到灣仔東海旁 76 號 4 樓。廣州新軍之役的準備使用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便是在馮宅內縫製；所用武器也是藏在該處。當馮自由去了美國後，馮宅由他的妻子留守，三二九之役所用的軍械，部分也藏在馮宅¹⁵³。

灣仔東海旁 (East Praya) 即現時的莊士敦道，由於東海旁的門牌號碼早於 1901 年 12 月更改，因此現時常見 1901 年地圖的 76 號位置並非馮宅位置，而是地圖中 62-65 號，拆開了變成 70 至 87 號。1917 年 8 月 24 日，76 號門牌又改為 105 號，1930 年 7 月 18 日刊憲，改名莊士敦道，105 號改為 190 號，地段為 ML 107 s a 和 ML 108 SA，即現時全豐樓位置。

馮自由原名馮懋龍，1882 年在日本橫濱出生，1895 年孫文廣州之役失敗到橫濱，馮自由父親馮鏡如加入興中會，為橫濱分會會長，馮自由以 13 之齡加入（一般書刊指 14 歲為虛齡）。1900 年馮自由在康有為門下麥孟華主持的大同學校讀書時，麥說康有為不喜歡平等、獨立、自主等新名詞，特別不喜歡「自由」一詞。馮即在班大呼平等自由是天賦人權，並在黑板上寫上「馮懋龍改名自由」七個字。1924 年國民黨容共，馮自由大力反對，遭汪精衛和廖仲凱中傷，於是離開廣州到上海，在孫文死後，馮自由更遭開除出黨，到 1935 年，孫科才讓馮恢復黨籍。1949 年 12 月，因中共佔有了大陸，於是又搬到香港，在 1950 年，於灣仔中華基教會公理堂受洗。1951 年到台灣定居，1958 年去世¹⁵⁴。



1901 年灣仔東海旁地圖，馮自由故居所在的 76 號，當年為圖中 62-65 號之間，現為莊士敦道 190 號。

¹⁵³ 馮自由，《華僑革命開國史》，商務印書館，1946 年，第 20-21 頁。

¹⁵⁴ 簡又文，《馮自由》，《革命人物誌》，第六集，第 162-186 頁。

跋

這兩條史蹟徑的構想，最初是筆者替長春社的姊妹機構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準備在 2018 年 2 月 10 日叛逆之都一少為人知的維城反清據點導賞團的資料而起的。香港在清末反政府運動中有重要的角色，而且不限於早期活動，直到 1911 年的廣州起義和之後的暗殺活動，都是以香港為基地。筆者在準備各景點資料時，已翻閱過去的地圖，但仍不小心把堅道 70/72 號當成現址，因為當中只有這一個點的門牌不是現址，到導賞團後才發現出錯。現先向當日參加者說聲不好意思。

這引起筆者尋找其他同盟會在香港各機關現址的興趣。由於香港很多道路的門牌在早年經過大幅改動，追尋起來要花一段時間，但總算完成了這兩條史蹟徑。中西區史蹟徑中，只有結志街 52 號一個和孫中山史蹟徑的景點重覆，原因是基於導賞的考慮，當區的行路狹窄，不適合在路旁講解，因此選擇了空間較大的地方一次過介紹數個景點，結志街 52 號旁的百子里公園是個合適的地方，因此才把楊衢雲的舊居也算進去。

僅把這小冊獻給現在遭受政治壓迫的人，以史為鑑，不要成為壓迫的一方。

長春社高級公共事務經理李少文

本文只反映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長春社立場

